

川震十年 深度 川震十年

100億為什麼花了8年? 當香港援建遇上四川國情

四川重建,時任總理温家寶曾下令「三年任務兩年完成」,而香港援建四川的工作花了整整八年。這是內地與香港兩地政府第一次全面、深入的大規模合作,主事官員說,是「在內地講一國兩制」。港方表示要對批准撥款的香港立法會和市民負責,而川方最擔心的,是「上面」是否滿意。

端傳媒記者 吳婧 陳倩兒 發自香港、成都 | 2018-05-14



2016年5月11日,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率領的香港特區代表團訪問四川,考察映卧公路、中華大熊貓苑等香港援建四川地震災區重建項目。 林鄭月娥(左)和卧龍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張和民(右)参觀中華大熊貓苑。 攝: Imagine China

2016年底,四川省道**303**映秀至臥龍段、綿茂公路漢旺至清平段建成通車,香港援建四川地震災區工作宣告結束。多數人聽到這一消息的反應是——竟然才結束!

這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對外援建,歷時八年,投資超過**100**億港幣。它集結了香港社會四面八方的力量:除卻牽頭的香港政府,還有工程、建築、康復醫學等各界別的資深人士和大大小小數十間**NGO**。

「四川重建是在内地講一國兩制。」時任香港發展局四川重建組副組長的唐錫波對端傳媒表示。川港雙方經歷了援建項目被曝六成不達標、已投入使用的校舍遭四川單方面拆除,以及因項目進度追不上中央指示被批等重重風波。香港的制度和思維是如何進入充滿中國大陸特色的援建工作,又得到怎樣的反饋?兩方磨合帶來哪些改變?八年過去了,曾主導援建的港方負責人林鄭月娥如今已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,這一次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中港項目合作,對日後香港被動或主動進入中國大陸政經格局的過程,留下了什麼樣的經驗?

端傳媒重訪香港援建四川的雙方主要負責人: 時任香港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麥齊光、時任四川重建組副組長唐錫波、時任 臥龍管理局局長張和民以及臥龍特別行政區副主任夏緒輝,試圖重現近十年困難重重的合作中,兩地碰撞的生動經驗。



香港援建四川的港方主要負責人,時任香港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麥齊光(右)與時任四川重建組副組長的唐錫波(左)。攝: 林振東/端傳媒

「聽説林鄭月娥對熊貓、臥龍有印象」

「100億援助,香港不是隨便説我給就給了,而是要向立法會申請撥款。」

2008年**6**月中旬,中國大陸**19**個省市領到援建汶川地震災區的任務,一個省「對口」援建一個重災縣(市),但同是重 災區的臥龍被剩下了。

「我們地方那麼小,省援建不太現實,」時任臥龍管理局局長的張和民對端傳媒表示。臥龍位於汶川縣西南部,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,其中連綿的邛崍山脈是大熊貓主要棲息地之一,但區內只有兩個鎮,人口不過**5000**多。

張和民想到了香港。2007年,適逢香港回歸十週年,中央曾從臥龍挑選一對熊貓贈予香港,彼時在民政局任職的林鄭月娥負責操持此事。「聽説林鄭月娥對熊貓、臥龍都很有印象。」張和民便去向林鄭月娥求助。

兩方努力下, 香港援建臥龍的意向很快被敲定。

此前,時任香港特首曾蔭權同澳門特首何厚鏵一行人到汶川地震災區訪問。澳門表示,我們沒有人、又沒有力,但我們有錢,當下許諾捐款50億。這讓同去的香港人有點窘。「香港不是隨便說我給就給了,因為要向立法會申請撥款,所以只是一個pledge(承諾),我們打算、或者說我們願意給一百億,」時任香港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麥齊光對端傳媒回憶,「人家澳門都50億了,我們不可以少過澳門嘛。」

7月,香港民政事務局向財務委員會申請20億港幣作為四川重建的首批撥款。儘管有議員認為中央有足夠財力應對援建、並質疑此舉是政治捐獻,批款動作依舊像浸了油一般順滑——從行政會議通過援助計劃到撥款審議通過,只用了十天時間。

「超快啦,」麥齊光說,「你可以比較一下,2008年是很快的,2018年我不知道啦。」

2008年汶川大地震激蕩起香港市民的極大同情。震後一周,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訪問逾千名香港市民,超八成受訪者說自己已捐款,近九成表示對内地非常有民族感情,並承認地震提高了這一感情。而據香港大學當年6月的民調,香港人對「中國人」身份認同達到8.02分(滿分10分),是1997以來的最高點。高位一直延續到同年的北京奧運。

此後,「豆腐渣」校舍、捐款去向不透明、毒奶粉等醜聞陸續曝出,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從**08**年的高位一路震蕩下跌,到**2017**年底跌至**6.89。2013**年四川雅安地震,香港市民捐給紅十字會的地震捐款,比起汶川地震暴跌**95%。**

「香港在外大規模、以大筆錢做重建是前所未有,以後也可能很少會再有。」憶起對四川援建的經歷,麥齊光感慨道。 從2008到2009年,香港立法會三次表決,共批准援建金額90億(包括2008年7月批准的20億),加上香港賽馬會捐獻 的10億,共100億港幣。



省道303公路及綿茂公路建造情況。 圖:政府圖片

應對管理衝突: 「特殊手段」

在給錢就完的「支票工程」,和一切全包的「鎖匙工程」之間,香港選擇了折中方案:**190**個項目的川港合作制。

這**100**億港幣要怎麼用?麥齊光說,一般是兩種模式:一種是「支票工程」,「我們簽一張cheque(支票)給你,你去搞定它啦。」還有一種是「鎖匙工程」,由香港的設計和施工隊伍到四川建設,建好後交「鑰匙」給四川。

「支票工程」很快被否決,因為撥款被如何支出,需要向立法會交代清楚,「一毫子都要知道用在哪裏,」麥齊光說;但鎖匙工程又太昂貴,「你不能資助一個工程隊坐飛機去建設。」後來香港選擇折中方案——項目制。四川列出希望被援建的項目清單,香港從中挑選,最終選中190個項目,包括151個政府項目、32個NGO項目和7個賽馬會項目。

每個項目分階段撥款,第一階段做完,驗收後再支付第二階段款項。所有項目依照內地法律和標準施工。港方對項目進行檢查並提供參考意見,川方負責正式質檢和最終驗收。

項目制,意味著香港和四川要在項目落地的過程中,全程磨合。從招投標、到進度管理,再到預算審批,每一個環節,都暴露出兩地在政府體制、組織架構到管理文化的巨大差異。「我們之間的差異成為了障礙」,唐錫波回憶道,「我們常在香港說一國兩制,四川重建是在內地講一國兩制。」

第一道障礙就是招標。

唐錫波用「特別痛苦」形容招投標過程,「我們面對很多流標、廢標、重新招標,花了很多力氣幫助他們解決管理的問題。」

比如,香港的慣例是打捆招標,即多項工程同時做設計、施工招標,一來減少標數、加快進度,二來方便管理。內地的習慣則是分拆招標:設計招一次標、施工招一次、監理招一次......「我們有**150**多個項目,你算一算要做多少次招標。」 」唐錫波説。儘管港方希望項目都採用打捆招標,但最後只有**30**多個項目做到。

四川方面不是沒有考慮過打捆招標。據唐錫波回憶,四川省想推行打捆,但在地方層面遇到了困難,部分市長表示,減少招標就是少人中標、減少就業機會。

「打捆招標在進度上幫助很大,但管理難度也很大,有的單位中了很多項目,但能力不足,會出現重視這個項目、輕視 那個項目的問題,」臥龍特別行政區副主任夏緒輝說,香港對內地建築市場不熟悉,想用香港的形式要求內地,「但港 方市場發育已經很成熟了,四川還在發育中。」

要不要進行打捆招標——是援建過程中川港雙方遇到的典型矛盾之一,其特徵和近幾十年來內地走向國際化遇到的無數爭論一樣——香港覺得這是先進的、好的、國際通用的,四川覺得我們有自己的國情。

「招投標過程我們特別小心,盡量避免參與評標的工作。」唐錫波説。出錢的港方為避嫌,一般不介入具體招標,但是 招標過程的管理混亂,令隱患時時可能爆發。



卧龍保護區鄉土文化遺産。圖: 政府圖片

作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, 臥龍承擔著野生動植物(包括大熊貓)的監測、保護工作, 但多數保護站在地震中嚴重損毀, 需要香港援助重建。

其中一座選址於山上的保護站,因為整座山沒有任何道路,導致運輸建材、裝備到山上非常困難。但是,川方在招標文件上沒有介紹清楚這一情況,施工單位在競標前也沒去現場考察,直到中標後開工才發現問題。這筆超出預期的運輸費用令施工方感到無利可圖,遂用停工相逼,申請額外的運輸費,被港方拒絕。

工程由此陷入長達一年多的拉鋸戰,做一點、停一點。「招標文件要求去踩點,你沒有去,那往後應該是你的責任 嘛,」唐錫波回憶起來,仍然眉頭緊皺。他坦承從招標籌備到後期監管,都暴露各種問題,「我們非常不滿意、不開 心。」為了給施工方壓力,港方最後只好派人親自去現場盯著。

即使隔著電腦屏幕,夏緒輝也能感受到唐錫波的怒氣。「唐先生一生氣就是發函、給我們寫東西,但不會在臉上說得太多。他發函語氣說得很嚴厲,出現『我表示强烈的關注、强烈的擔憂』這些詞,那就是相當嚴重了。」項目出現變動是夏緒輝最害怕的事,「這是壓在我心裏最大的一塊石頭,每次變更,我都不好意思給唐先生(唐錫波)講。」

談起這個引發報道的項目,夏緒輝態度淡定:「(工程)確實很困難,我們沒有估計到材料運輸的問題。我們本來要補一些錢,但施工方漫天要價。這個項目有很多爭議,最後把項目做完,我們就算完成任務了。」

保護站的糾紛最終通過一種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方法解決了。港方找到四川省政府和發改委,透過他們來協調此事。 「唐先生著急、發改委也著急,最後採取一些特殊手段讓項目完成,給施工單位做工作、談心,」夏緒輝說。川港雙方都不肯多說「特殊手段」具體是什麼,唐錫波的回應是:「這不是好的解決問題的例子,因為最終還是要打官司。」

以招標為起點、川港雙方在理念和執行上的差異逐漸開始「短兵相接」。

如何衡量成效: 「他們覺得酷炫, 我們覺得土」

「他們不能用平常心去看待『好看』這件事,因為書記要的是形象。」

對於援建臥龍,香港有自己的雄心。在四川,香港援建的多數學校、醫院都是在原址清拆、到旁邊重建,一間換一間,且項目很分散,但臥龍是國際知名的科研基地,香港的考量是,把錢集中投入這裏,肯定比撒在幾十個分散的項目更能體現成效。

「臥龍的熊貓基地是重新找一(塊)地,沒有限制地做一個好的建築。」麥齊光説。採訪中,麥齊光和唐錫波都不止一次地强調: 「這根本不是重建,而是再造臥龍。」

再造的過程中,融入了香港對臥龍社區的長遠打算:每所學校、醫院都有隔震設計;每間學校都有大運動場,可用作災難時期的避難所、指揮中心;福利院要有電梯,研究中心要有殘疾人通道......儘管這些不會有「煥然一新」的視覺效果,也沒有短期可見的效益。

「他們不是為了重建而重建,而是考慮到我們在地震帶上,以後再遇到地震要有避難的場所,」張和民說,但川方則擔心,在這些項目上錢花得太多。



都江堰熊貓基地邀請了西南建築研究院的錢方「操刀」,摒棄原先的現代建築設計,採用四川民居風格,用園林將一組一組的建築物連接。攝: 林振東/端傳媒

以臥龍援建的重點項目——大熊貓基地為例,川方拿出的第一版設計,嚇到了負責對接的香港團隊。據當時在場的一位 建築師回憶,唐錫波看到設計稿後連連歎氣:「設計怎麼這樣!内地賺錢賺瘋了!簡直是亂搞!」十年後,唐錫波仍對 那份設計稿記憶猶新:「太誇張、太想表現自己。但項目的主角不是建築物,是環境。」

「他們覺得酷炫,我們覺得土,」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王維仁是港方建築師顧問團的一員,他指出兩地在設計理念上的一個根本分歧:港方希望設計低調、隱蔽、不影響熊貓生活,內地的設計則很招搖,甚至有一條建在熊貓頭頂的walkway(通道)。「他們不能用平常心去看待『好看』這件事,因為書記要的是形象。」

圍繞大熊貓基地的設計,川港雙方展開了多次會談。前兩次,川方的簡報都被港方否決了,「第三次他們聞(嗅)出方向了,」王維仁説。

在多次磨合中,都江堰熊貓基地邀請到西南建築研究院的設計師錢方操刀,採用四川民居風格,用園林將一組一組的建築物連接。「每組建築的位置和功能都有仔細研究,包括日照、通風、地熱、雨水回收。」唐錫波説。香港援建的臥龍、都江堰兩個熊貓基地,後來都拿到了最高級別——三星級綠色建築認證。

在設計過程中,香港亦從現實出發做出了妥協:將一些地方開放給遊客。唐錫波説,原本最理想的設計是熊貓完全看不到人。但如果當地要改變經濟結構、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,必須放棄林業、畜牧業,找到其他途徑貼補收入,生態旅遊就是其中之一。而吸引遊客的唯一辦法,即是讓人看見熊貓。

項目對誰負責: 「怎麼可能停止向立法會報告?」

「香港人每件事都要開會討論,簽過的文件能堆滿整個房間。」

合作之初,香港團隊在四川施工現場看到很多匪夷所思的畫面:有醫院墻已經建好了,但電線還沒有埋進去,「他們要快、要先做,之後又要把墻打爛做電線、喉管、污水渠……」麥齊光說。還有一間建在河邊的醫院,港方考察發現河邊就是斜坡,一旦水位上漲,就會沖刷斜坡、醫院有可能塌下去。川方打算直接施工,港方則要求先在旁邊建好保護的結構圍欄。更令港方不能理解的是,對援建學校的設計、施工和驗收進行監管的人竟然不是專業人士而是該學校的校長。

「校長的功能是教書,不是建學校吧?」麥齊光問。

「一開始我們不太理解,香港人太認真了嘛,不能有半點差池。」張和民説,香港人每件事都要開會討論,他簽過的文件「能堆滿整個房間」。

「有人不理解,覺得港方管得太細,制度太刻板,有些事會推不動。內地政府機構更靈活,更能結合實際辦事,有些事在發展階段要及時做出決定,我們就想按自己的方法做,」夏緒輝說,「但現在覺得有些流程還是需要的。」

夏緒輝記得,合作初期,「唐先生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。」港方聘請了獨立的工程管理機構對川方在建項目進行檢查,「一個人來搜集資料,也不跟我們交流,回去發給我們一堆問題,我們都蒙了。」



香港援建四川地震,中方其中一位負責人,臥龍特別行政區副主任夏緒輝。攝: 林振東/端傳媒

這是香港建項目的老習慣,請第三方公司監察進度、資金和質量,發回報告。香港再就報告發現的問題要求四川改進,同時將報告發給立法會。至今,在香港援建四川的專頁上還能查閱、下載這些長達數百頁的報告,每半年一期,極盡詳細,連施工現場油漆桶擺放位置有誤都會記錄在案。

在港方要求下,川方的做法亦在逐步調整。麥齊光說,四川發改委非常欣賞這套做法,援建工程進行一年後,四川如法 炮製,請第三方監察工地。

透明亦是責任。**2011**年**7**月,有香港媒體調查立法會報告,撰文批評援建項目六成不達標,事情迅速在中港兩地發酵,最後驚動了北京。

「北京責成四川,四川就責成我們,」麥齊光説。他和唐錫波被叫到四川開會,「進去(會議室)就有光火,對他們來 說是很不愉快的一件事。」

「他(四川一位高級官員,麥和唐拒絕透露其姓名)幾乎當面斥責我們,」麥齊光說,對方以産生太多問題為由,要求香港以後不要給立法會寫報告。

「怎麼可能停止向立法會報告呢?這筆錢是立法會批核給我們,我們要報告進度,」麥齊光說,「公務員最重要的是為公務做事,要『是其是、非其非』。」港方堅持要繼續報告,雙方僵持不下。那天開完會,通常會一起吃頓便飯的川港官員沒有吃飯,各自離去了。

「核心差異是對媒體的管理風格,我們香港不在意《明報》怎樣寫,可是四川就不一樣。」唐錫波說。麥齊光接道: 「我們在香港對傳媒是盡量解釋,但內地就不想,他們會覺得不要煩我。」

關於「六成不達標」的指控,唐錫波回應:「每個項目有很小的問題,我們都記錄在案。一個項目可能有五、六個 **defects**(缺陷),但都很容易就能解決。」

中國保護大	大熊貓研究中心	〉 (序號: 23)	
記錄管理	2011.05.25	 沒有工程質量監督手續,管理單位表示質量監督手續已交上汶川建設局,估計2011年6月可獲批覆。 沒有施工許可證,管理單位表示施工許可證已交上汶川建設局,估計2011年6月可獲批覆。 	顧問已提出整改要求,川方正積檔處理,顧問將於稍後覆檢跟進
管理局辦公	和職工工作用	房 序號: 24)	
記錄管理	2011.04.26	 沒有工程質量監督手續,管理單位表示質量監督手續已交上汶川建設局等待批覆。 沒有施工許可證,管理單位表示施工許可證已交上汶川建設局等待批覆。 	顧問已提出整改要求,川方正積極處理,顧問將於稍後覆檢跟進
耿遠一貫制	學校 (序號:	25)	
質量管理	2010. 10. 22	 小學部敦學樓 1 樓部分樑混凝土品質較差,樑表面出現蜂窩麻面情況。 中學部敦學樓軸線 14 部分下支墩品質較差,支墩上部偏位,可能影響軸力直接傳遞。 	·顧問已於 2011 年 4 月覆檢,確認川方已完成整改工作。
記錄管理	2010.06.30	• 工程開工時尚未取得施工許可證,但臥龍管理局允許施工單位開工。	·顧問已於 2010 月 11 日覆檢 · 確認川方已提交資料。

檢視分類	觀察日期	觀察要點	跟進工作
臥龍鎮中心	小學 (序號:	26)	
質量管理	2010. 10. 21	 宿舍樓及教學樓 D 區部分地樑混凝土品質較差, 樑表面 出現蜂窩廰面情況。 宿舍樓 3 層部分柱鋼筋間距與施工圖紙不符, 出現間距過 寬或太窄情況。 	·顧問已於 2011 年 4 月覆檢·確認川方已完成整改工作。
	2011.04.27	個別框架柱出現蜂窩麻面情況。個別屋面框架樑出現漲模現象。	顧問已即時覆檢,確認整改工作已完成。
記錄管理	2010. 06. 29	• 工程開工時尚未取得施工許可證,但臥龍管理局允許施工 單位開工。	·顧問已於 2010 月 11 日覆檢,確認川方已提交資料。
醫療保護	建 (序號: 27)		
安全管理	2011.04.26	 耿達衛生院後斜坡部分臨時支護被拆除,施工單位解釋因主體施工時需暫時拆除支護架。 	顧問已於翌日覆檢,確認川方已完成整改工作。
記錄管理	2010. 10. 22	 施工圖紙沒有明確說明構造措施的抗震設防烈度為9度。 施工圖紙中有小部分抗震支座軸線與上部結構柱不在同一軸心線,可能出現支座受力不平均。 	・發展局已於 2010 年 11 月覆檢・確認川方已解決問題。

2011年6月香港援建報告中列出的項目問題。圖: 文件截圖

端傳媒記者查閱引發爭議的2011年6月報告,其中不達標的問題包括「工人高空作業未戴安全帽」、「無施工安全巡查及例會會議記錄」、「個別教室內漏裝一個插座」等小問題,但也指出了「部分柱鋼筋焊接不合格」、「部分地樑混凝土品質較差」等安全隱患。在這些問題後註明了港方跟進處理的進展,其中約六成註明已修復,其餘則「正積極處理」。

這正是川港兩方工作方式不同的根本來源:「工作對誰負責」的標準不同。香港團隊要面對立法會和它背後市民、媒體的層層監察,四川團隊最擔心的,是「上面」是否滿意。

港方堅持原則, 反而激活大陸彈性

「基建工程的價值不在於外在,而在功能。門口粉飾得很漂亮,剪綵進場了,其實裏面只有兩間房。」 」

2012年5月,到四川考察援建項目的唐錫波得知,剛落成一年多的綿陽紫荊民族中學(下稱「紫荊中學」)正在被拆除。學校原名綿陽民族初級中學,在汶川地震中嚴重受損,後由香港政府、香港教聯會、綿陽市政府三方共同出資,合共約700萬港幣,在原址重建。學校於2010年3月底投入使用。

2010年底,紫荊中學所在地塊,被綿陽市政府拍賣給萬達商業地産股份公司,香港政府和教聯會都對這場拍賣毫不知情。據媒體報道,萬達將投資60億元人民幣在該地塊建萬達廣場。之後川港雙方幾次溝通,綿陽市政府表示將另闢一片地,投7000萬元人民幣異地重建學校,建成後依舊是香港援建項目,校名也不變。這一提議被港府拒絕了。

隨後發生的事情超出了港府的想象。夜裏九點多,聞訊趕去紫荊中學的唐錫波,看到教學樓「bing ling baang laang baang baang laang baang baang laang baang ba

香港要求連夜開會,由港方、四川發改委和港澳辦共同參加,在會議上,香港團隊態度堅決: 割掉項目、撤回投資。

「學校在我們未同意之下拆掉了,他們已經破壞了承諾,這不是你建一間新學校可以彌補的,這是承諾的問題。」唐錫 波說。

「難道你有錢就可以為所欲為?如果我們接受了,以後每個開發商都可以拆掉你的建築物在旁邊重建一間,我們還有信用麼?」麥齊光說,「如果有記者發現了怎麼辦?記者會問為什麼學校突然不見了?我們怎麼答?」

麥齊光和唐錫波都記得,當時四川對接援建的官員哭著求港方保留項目。「他們要向中央解釋,為何突然少了一個項目,所以他們很擔心。」唐錫波説。



唐錫波在南江縣朝陽中學建築工地上視察。圖: 政府圖片

事情最後驚動了國務院,四川省政府隨後下發紅頭文件,要求捐助和援建項目的任何重大變更都必須尊重捐助和援建方意見。香港對原則的堅持反而激活了大陸體制中具有彈性的一面,這種彈性在有關項目工期的矛盾中,也有明顯的體現。

2010年**9**月,根據時任總理温家寶此前提出的「三年任務兩年完成」目標,各省的對口援建項目基本完工,只有香港「拖了後腿」。

除了在批款、選項目和前期調研上投入不少時間之外,港方代表唐錫波和麥齊光都一早直言,「三年任務兩年完成」是 不可能的。

「即使我投放大量人手,日以繼夜地工作,石屎(水泥)、鋼筋、混凝土都要七日才會有力,之後才可以造另一層,所以一定要按程序辦。」麥齊光對那些匆匆建好的「面子工程」發出質疑: 「每一個基建工程的價值不在於它的外在,而是其功能。尤其是醫院,有很多水電、儀器的安裝、測試,升降機未做好,難道你把病人抬上去麼? 門口粉飾得很漂亮,剪綵進場了,其實裏面只有兩間房。」

但是,在總理設定的目標前掉隊,沒有壓力是不可能的。夏緒輝回憶,香港和四川省委那時都覺得不好交代、壓力很大。後來港澳代表一起去四川同某位領導人談工程進度。「真的會有壓力,他們說我們香港的工程進度慢,」唐錫波回憶,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展示了詳細報告,對方看過之後反而表揚了香港。

「在内地講一國兩制」的過程裏,麥齊光和唐錫波都看到另一種制度在四川種下的影響。



省道303公路及綿茂公路建造情況。 圖: 政府圖片

「一國兩制」在四川的影響

「港方只談工作,私下一次茶都沒喝過。我們請他們吃飯,他們也不吃。」

漫長的援建過程裏,四川並不避諱他們從港方身上學到很多東西。「術業有專攻,」張和民說,「原來我們很多時候一 把抓,分工不精細,現在我們也按照香港進行分工了。」

此前川方的項目管理都是成立一個小組來負責,「政府不太放心交給一個人,但人多了以後,反而沒有人辦事。」夏緒輝說。與之相對,港方都是一兩個人負責一個項目,溝通、問責都指向明確,項目進行到後期,川方也採用了這種方法。

香港項目管理的金科玉律是「TCQ」(Time、Cost、Quality),内地的項目管理則主要是管錢。每次川港兩方開會通報進度,港方的進度表上會清楚標明耗時、進度、造價和質量;川方則會報告非常精確的花銷,他們舉著報告、宣讀每一筆開銷,甚至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,項目的進度和質量卻涉及不多。開了幾次會後,四川發改委的官員對麥齊光說:「麥先生,不如你把你們那報告給我們吧,我們跟著你那樣做。」

「説實話,跟港方打交道還舒服些,内地官員比較有上下級觀念,香港沒有。他們只談工作,私下一次茶都沒喝過。我們請他們吃飯,他們也不吃,」夏緒輝説。

唐錫波笑説經過很多年,四川發改委的做事方式也慢慢被香港「同化」了,「從開會到説話、做報告」。儘管衝突無數,他和麥齊光都和當地團隊成了朋友。「我們沒有政治目的,只是真心做事。」唐錫波説。麥齊光笑著插了一句: 「他(們)覺得我們無害。」

當兩地團隊在一個又一個項目中點滴磨合的同時,中港關係亦經歷了無數政治風波,**2008**年積攢下的温情已被消耗乾淨。問及心態變化,麥齊光答得謹慎:「政府是會改變的,國家是不會變的,我們的土地、人民是不會變的。」

2008年10月,唐錫波第一次進入「山河破碎」的臥龍,因道路在地震中徹底損壞,一行香港官員繞行十多個小時。在漫長的盤山路中,唐錫波下車休息,看到遠處白雪覆蓋的四姑娘山,拍下一張照片。這張照片用作他辦公室電腦的桌面,直到今天。

(張潔平參與川震十年系列策劃及編輯工作,特此致謝。)

(端傳媒實習記者譚德恩、張竟禕對此亦有貢獻)

川震十年

